

黄帝陵所在地之我见

赵世超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黄帝是被神话了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各地的陵庙、故里都是纪念性建筑,没有必要争论真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祭祀地点却有约定成俗的意义,有助于加强统一,应当沿袭和遵守。

关键词:黄帝故里;黄帝陵;皇甫谧;《帝王世纪》;阴阳五行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2-0001-05

长期以来,我不愿意谈黄帝。因为既有历史上的黄帝,又有文化史上的黄帝,更有作为民族统一象征的政治化的黄帝,我应该从哪个角度谈呢?更何况,黄帝真正是“层累式”塑造起来的人物,他的不断被改塑的过程起码已二千好几百年,个中演变的脉络非大专家莫能窥其究竟。然而,自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大专家到哪里找呢?所以,就我本心而言,最好是不谈,越谈越乱,越谈越失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陷于自相矛盾。在此,我仅略陈浅见,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黄帝本事见于各类古书,但其史料价值却不一样。以我陋见,《左传》、《国语》勉强算是第一等的材料,《史记》、《汉书》、《后汉书》已在其次了。这不仅因为两类著作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更因为后者经过较大的剪裁,加进了作者的主观判断,也受到了当时所流行的主体文化的影响。如,司马迁自己就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故而,他在“论次”时,就仅“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之

首”,可见已对原始纪录做了改造。诸子书是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但有“以事言理”的传统,书中的黄帝或出自传闻,或因争鸣需要编造而成,不能都视为铁定的证据;《水经注》之类的地理书因作者多赴实地考察,可信用不亚于诸子。基于此,我将这两类书列为第三等。最后,第四等是《帝王世纪》、《路史》和类似《龙鱼河图》这样的谶纬之书,何以将其置于末位,其原因应该算是个常识问题,真正学过历史的人都清楚,毋须多言。

《国语·晋语四》:“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很显然,确定姬水、姜水为哪条水,对弄清黄帝、炎帝的发祥地及活动区具有很大意义。《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即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渭河的小水,因其流域正是姜族繁育的中心,故这一段岐水自古又有姜水之称。至于姬水,酆道元引南安姚瞻的说法,认为就是天水“上邽城东七十里的轩辕谷水”。以此为基本依据,徐旭生等学者提出了

收稿日期:2013-04-07

作者简介:赵世超(1945-),男,河南南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以炎、黄为主的华夏集团起自西北的假设，逐渐东迁后，炎帝族在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族在甘肃及陕北一带，获得了重要发展，以后分别沿偏南和偏北的路线继进，开始抵达中原，与东夷集团产生接触和争夺。从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一看法较为平实，除炎、黄后裔多保有关于昆仑的古老记忆和考古学文化可以提供一些佐证外，就是因为《国语》、《水经注》一类的书相对可靠。

然而，近来祭黄活动搞得颇具声势的河南却另有说词。他们坚持认为，不仅黄帝生于新郑，县城北关就有轩辕故里旧址；而且，黄帝宫在新密，黄帝铸鼎处及黄帝陵在灵宝，总之，都不能出于现今该省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外。由于观点大胆而新奇，很惹人关注，我便翻了一些文章，发现作者所引用的较早材料只有两条。其一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主要的一段文字为：“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县是也。”为了突出重点，引者多用断章取义的手法，舍弃“或曰”及其以前的部分，只保留最后两句。于是，古书为增广异闻而采入的“或说”就变成“正说”了。其二是《续汉书·郡国志》梁人刘昭的注。但引者多将志文“河南尹，新郑县”与注文“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拼接，造成结论出自于司马彪的印象。而且注文前的“皇甫谧曰”四字也被径行删去。实际上，不仅“黄帝都新郑”仅是注释家梁人刘昭的意见，而且刘昭早已老实承认自己的意见是袭自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至于被用作证据的其他典籍，如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明陆应明的《广舆记》，清吴乘权等辑的《纲鉴易知录》、郭袁恒的《历代帝都考》、康熙二十四年的《开封府志》及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等，其成书年代更较晚近，且因袭之迹，斑斑可寻。如此看来，对“河南说”的鼓吹与炒作虽然万人汹汹，势头甚猛，而风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帝王世纪》。而如前所言，《帝王世纪》远远算不上是上乘的史学著作，若仅凭此立论，起码也有“孤证不立”之弊；况且，作者皇甫谧把黄帝“都新郑”列为“或说”，表明连他本人都不十分自信。

三

皇甫谧于《晋书》有传，籍隶安定朝那，为汉末名将皇甫嵩曾孙。初时并不好学，乃至游荡无度。

后受叔母教诲激励，折节而为善士，躬自耕稼，带经而农，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终年手不辍卷。自以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故屡征不仕，即便是晋武帝频下诏敦逼，也仍上疏坚辞，朝廷见其辞切言至，遂特听许，并送一车书与之，以示鼓励。谧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堪称高产，六十八岁卒于家。细读传文，我们在对他的淡泊利禄、勤奋好学深表赞赏的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因终身未离偏远乡野而眼界未开的人，是一个“守学好古”的食古不化者。如，他在《帝王世纪》中根据所见古籍计算，说“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时，“九州之地”总共是“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且不说“定垦者”与“不垦者”相加与前边的总数不合，原文就有错误，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您能相信是真的吗？故而，当时人即称皇甫谧为“书淫”，现代严肃的学者及其著作也认为《帝王世纪》是皇甫谧“大抵依据汉以来纬书等等之说”、“自己编造的”。今天，借《帝王世纪》招摇过市者，大有人在，一类是无知，一类是蓄意为之。在我看来，后一类人更为可恶。因无知而出错，可以原谅。为迎合某种倾向而明知故犯，就是别有用心了。

尽管如此，《帝王世纪》毕竟保留有晋以后已失传的古史材料，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同时，皇甫谧既然在叙述过“黄帝都涿鹿”后，又将“都新郑”列为“或说”，证明后一说法在汉晋间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那么，新郑说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我们不妨多费些笔墨，追述一下战国人邹衍所创立的阴阳五行说。

自春秋末到战国，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孔、孟叹世风日下，谋“克己复礼”，以期使“天下归仁”。但儒家讲究的“登降之礼，趋详之节”却让人十分厌烦，他们虽周游列国，以光大其道，结果竟是“持方枘欲纳圆凿”，终不能入，甚至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

邹衍则是个随时而化的聪明人。他接受“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的教训，不直接讲礼义忠信，而是采取“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的办法，先在心理上把人抓住，诱导诸侯逐步去走仁义节俭的正路。正因为他不按常规出牌，“其语闳大不经”，又常“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反而能使“王公大人惧然顾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邹

衍也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与孔、孟的遭际截然不同。

对邹衍打出的王牌,司马迁做过很好的概括,其核心部分是“先序今以上至于黄帝”,“载其機祥度制,推而远之,至于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深观阴阳消息”,“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大意是说,邹衍通过对阳长(息)则阴消、阴长(息)则阳消的自然规律做深入考察,来总结自黄帝到战国的历史,并把阴阳消长的过程分散到五行中去,以五行能否顺利运转作为阴阳能否正常消息的前提,进而既用五行相生原理解释一年中阴阳的变化、节候的更替、万物的生长收藏,乃至风霜雨雪、祸福休咎,又用五行相克的原理解释政治的盛衰、朝代的兴亡和历史的循环。

在邹衍一派学者看来,一年之内,从冬至到夏至,阳气理应一天天增长(息),阴气理应一天天减弱(消),此可谓之阳轨;从夏至到冬至,阴气理应一天天增长(息),阳气理应一天天减弱(消),此可谓之阴轨。倘若在阳轨上多做助阳抑阴之事,在阴轨上多做助阴抑阳之事,就能使五行顺利地运动轮回,阴阳正常地交感交合,达于和谐,从而带来风调雨顺、疠疾不降、民不夭折的好结果,万物生生不息、繁衍不绝。反之,如行事悖谬,使阴阳二气不能如期生长或消退,则会存在愆阳、伏阴,并酿成干旱、蝗灾、霜雪、霹雳、凄风、苦雨,出现禾稼不熟、五谷不实、民殃于疫之类的惨局,甚至引起暴兵来至、土地侵削。进一步推而大之,长期阴阳不调,又不恐惧敬改,更意味着旧德已衰,新德将兴,于是,“天必现祥乎下民”,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就要开始了。这种新德代旧德的循环就叫五德终始说。

不难看出,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用五行生克、阴阳消长、五德转移的理论,解释一年四季的诸多变化和历史演变的规律,并借以规范人类、特别是王者的行为,这便是邹衍学说的实质。到战国中期,居火德的周朝经历了700来年的发展,早已衰落得不成样子了,强大的诸侯无不急于取而代之,但究竟谁能稳居帝位,局势并不明朗。依照邹衍的理论,“代火者必将水”,而且他推断说,天很快就要降下“水气胜”的符应,“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一旷世稀有的大预言为诸侯们的觊觎之心提供了理论依据,自然会一拍即合,受到他们的热切关注。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邹衍死后,燕齐海上方士传其术者,不可胜数。或许正是经过这些人,做什么、如何做能起到助阳抑阴或助阴抑阳的作用,以

便促进五行顺利运转、阴阳正常消息(长),又被具体化为《时则》或《月令》。到秦统一天下,齐人上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始皇采用之,依水德推德定制,从此,阴阳五行理论正式进入宫廷,成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官方哲学。自刘邦建汉,改德的做法便为历代所沿袭,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两汉诸帝则更以调和阴阳的最高责任人自居,随时提醒自己和臣下,在处理各类政务时,必须严格遵守《月令》的规定,绝不能妨碍五行完成其一年中相继生的循环。至于民间,从宗教活动到生活习俗,也全部阴阳五行化了。连董仲舒改造儒学,也不得不以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为框架,把儒法结合、王霸相杂的政治论包装起来,才能献给皇帝。可以说,汉代的社会是弥漫着阴阳五行观念的社会,汉代的政治是以燮理阴阳为基本宗旨的《月令》政治。

说了半天,这与黄帝“都新郑”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汉代的《月令》政治下,五行与方位、季节、颜色、人事及宗教活动等,都整齐地搭配起来了。为了促进阴阳正常消息(长),《月令》不仅规定了帝王每月应住什么朝向的宫殿、外出驾什么马拉车、吃什么粮食和牲肉、用什么器皿、行什么政令,而且还规定了分别主管各季及各方的帝和神,以供人们崇拜。而黄帝在五行家看来,就是中央之帝,同时派给中央的神叫后土。《淮南子·天文训》曰:“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时则训》又说:“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并不是黄帝的活动区一定就在中原,而是由于受到笼罩一切的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黄帝被人为地配到了中央。所谓中央“钧天”为“韩郑之分野”及郑地确有黄帝后裔等,则不过是促成这一设计的“辅料”。东汉末的高诱在注《淮南子》时说:黄帝“死託祀于中央之帝”,“託祀”二字准确反映了当时人眼中的事物真象。

阴阳五行化的《月令》政治及人的行为可以通过助阳抑阴或助阴抑阳来感天的天人感应学说,虽在强调“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方面有重要价值,但却“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发展到后来,即成为谶纬迷信,连带着使接受了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的儒学也谶纬化了。物极必反,到魏晋之际终于出现了玄学兴而谶纬消的新转折。然而皇甫谧终生未离开乡间,皇甫谧没进过城,皇甫谧的家——安定朝那,又远离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阳。这就使他

失去了与玄学家们交流的机会，他读的书相信绝大多数都是汉代流行的纬书，他的知识完全没有得到更新。因此，他不仅没有竹林七贤那样的思辨与洒脱，也远不及高诱的多识与通明，他看见有什么材料，就抱着“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的态度照录下来，不作任何的分析和判断，不成想，他录下的一条“或说”在给某些后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历史增添了混乱。

四

与河南的祭黄中心新郑遥遥相对，陕西祭拜黄帝的场所设在黄陵县的桥山。理由很充足，因为多部古书都说，黄帝死后是“葬于桥山”的。可是，如果新郑的确是黄帝出生地和活动区的话，他在亡故以后为什么要辗转千里，返葬桥山呢？而且，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能够做得到吗？甚至，今天位于陕西黄陵县的桥山，是否就确实是黄帝的埋葬地呢？如果要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可以说处处都仍存在问题。

汉武帝时，汾阳地方上名字叫锦的巫师在脍上后土祠旁，发现了“异于众鼎”的特号大鼎，著名的方士公孙卿就趁机上书附会，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意思是说，昔日黄帝曾经铸鼎升天，现在您运气好，黄帝之鼎竟自动出于地下，不用再铸，只要用此鼎行封禅礼，也可升天。这本是一派缺乏逻辑的胡言，但武帝信了，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于是，乃拜公孙卿为郎，“使候神于太室”。可见当时的思想界还无力揭破祠灶、辟谷、却老、能仙登天这套方术的本质，在人们的脑海里，黄帝不仅是远祖和英雄，更是飞升仙化的先行者。

不过，没过多久，武帝就起了点疑心。元封元年冬，他听说古者必先“振兵释旅”，然后才能行封禅礼，于是乃“勒兵十余万骑”，“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于桥山”。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虽屡受方士蒙蔽，但毕竟很聪明，他忆起五六年前公孙卿描绘过的乘龙升天那一幕，就向随员发问道：“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从行诸人不免也有机敏而善谀者，乃抢着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如此搪塞能否让武帝释怀，不得而知，但却在无意间透露出，连元封元年皇上正式拜祭过的桥山黄帝冢，也是在秦汉陵寝制度的影响下而营建的纪念性墓园，

是否真有黄帝葬于其中，根本靠不住。

非但如此，《汉书·地理志》记上郡阳周县时说“桥山南，有黄帝冢”，王莽时改称“上陵峙”。《水经注·河水》条曰：“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峙，山上有黄帝冢故也。”汉之阳周县，后魏为显州，隋改为罗川，天宝初改为真宁，在今子长县一带，其地与奢延、走马二水均距在延安之南、西安以北的黄陵县较远，可知汉武帝北巡朔方时所祭的衣冠冢与今日的桥山黄陵并不在一处。

另外，《魏书》卷三说太宗拓跋嗣于神瑞二年夏四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很显然，此桥山在河北，也不在今日的黄陵县。

但是，今陕西黄陵县有黄帝陵庙又是千真万确的。黄陵，旧称中部，姚兴于坊州南设中部都尉，后魏太武帝正式设县。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了代宗的批准。坊州黄帝陵阙就是过去中部县、今日黄陵县的桥山黄陵。将在此地祭黄帝纳入皇家礼制，除离京城较近外，也说明这里素有上陵传统，影响较为深远。

《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或曰：水从山底经过为桥。既然到处都可找到这样的地形，既然黄帝是普遍接受的崇拜对象，而较古的史书又说过“黄帝葬于桥山”的话，那么，在广大的地区内同时或先后出现若干个黄帝陵，以供大家拜祭，有什么不可能呢？正如《山海经·海外南经》注所说：“圣人久於其位，仁化广及，恩洽鸟兽，至於殂亡，四海若丧考妣，无思不哀。故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酸哭泣，起土为冢，是以所在有焉。”注者郭璞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兼术士，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可以说已是一种文化史的视角，即：各地的陵庙都是因文化崇拜需要而形成的纪念性建筑，但纪念性的陵墓里却不一定真有圣人的尸骨。如果能够接受这一观点，则河南的黄帝故里、黄帝宫、黄帝陵，还有甘肃庆阳的黄帝陵、山西曲沃的轩辕庙，等等，都可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地相互争夺剧烈的其他传说人物或历史名人，如伏羲、女娲、尧、舜、禹乃至诸葛亮、关羽等等，也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

司马迁“西至空桐，东渐于海，北至涿鹿，南浮江淮”，倍尝辛苦，进行实地考察，所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于是，便在《五帝本纪》中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曾“东至于海，登丸

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羣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纪中黄帝的经历之处与作者本人的考察路线居然基本一致,可知他是把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和与之相配套的物化崇拜形式当作历史了。司马迁这样做,本意是让因材料太少而面目不清的黄帝变得丰满起来,以便系统成篇。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确定的“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著述原则。尽管他在纪文之末做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声明,承认自己仅是“择其言尤雅者”,勉强予以“论次”,但此种以传闻充史实的方法所产生的误导仍不可小视,害得无数后人在事迹钩沉、地理考证诸方面耗费了大量精力。我们是现代人,除了历史之外,我们还掌握有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手段。历史和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的任务是在厘清渊源的同时再将两者分开,而不是硬把文化现象说成历史,以便为各地争名人,或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

五

纪念性的黄帝陵庙可以分布于各地,但朝廷却只能选择其一作为官方祭祀场所。历代王朝为此都用颁诏的形式做出过规定。这不仅有助于规范祀典,更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政治统治和文化认同的作用。

前言唐代宗于大历五年采纳臧希让的建议一事,应是鄜坊节度使所辖中部县桥山黄帝陵得到皇家正式认可的开端。从此,这里的祭黄活动便从普通的宗教崇拜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官方文化和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大历七年,朝廷即在此大兴土木,创建黄帝庙,后又敕修之,足见一经升格,身价顿时倍增。然而,唐末五代,屡经离乱,“百司废坠,匮神乏祀”,前代帝王陵寝“或樵采不禁,风雨不庇”,甚者竟至“开发”、“隳毁”。鉴于典礼所阙已甚,故宋太祖一即位,就于建隆元年和乾德初两次下诏,规定为黄帝陵及炎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诸陵“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隳毁者修葺之”。到开宝五年,为了祭祀方便,又降旨将唐大历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至今址。至明朝建立,朱元璋乃于洪武三年遣使四出调查,并“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发现散于全国的历代帝王陵寝共有七十九处。数量如此之多,自然应加筛汰,于是乃责令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至洪武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可保留三十五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

陵致祭的地点,分别是:“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荣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鄱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皇上批准了这份名单,并规定每年在仲春和仲秋的朔日,“遣使诣各陵致祭”,每三年由皇帝“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为了保证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还要求每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单就黄帝陵墓而言,朱元璋不仅曾派秘书监丞陶谊前往勘察、修葺,派中书省管勾甘前往代表自己行祭礼,而且还在此设五品护陵官(后由县令兼护陵官、授五品衔),特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黄帝坐像一尊。因为元代一方面将伏羲、神农、黄帝并列为三皇,一方面又将三皇视为医家的祖先,改由医师主祭,与黄帝人文始祖的地位不合,朱元璋就下令废除了各地的三皇庙。由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经过唐代宗的开创、宋太祖的恢复和明太祖的整顿,对于历代帝王陵寝的祭祀已完全制度化,而皇家制度的确定性和严肃性,也使在中部县桥山黄帝陵进行的祭黄活动开始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大体说来,洪武年间的“礼部定议”,虽有人为因素,并不合乎历史,但却尊重了各地的民间习惯和文化传统。所以,它一经颁布,便得到了普遍的恪守和贯彻执行。在明代,自洪武之后,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年间,都屡屡遣使赴中部县桥山祭黄,至今陵区仍较系统完整地保留着当时记录致祭情况的碑刻。清代沿袭有明,一无所改,唯规模更大,仪式更加隆重,且在常祀之外,又于皇帝登基、太后寿辰、水旱灾害、五谷丰登、大功告成之际,增加了不少特祭。至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都把祭黄仪式放在这里举行,正体现了继任者对前朝制度和固有文化的尊重。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到此表达爱国之情,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纷纷到此寻根问祖,更说明制度行之既久,早已约定俗成。

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不误,我便想提出如下意见以结束本文,即:黄帝可以初步看作是被神话了的

(下转第23页)

局,1990.

[12] 张 礼.游城南记[M].史念海,曹尔琴,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3]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钱士升.南宋书:卷一[M].林开甲,唐子恒,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南:齐鲁书社,2000.

[15] 韩 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Chang'an image in the Song poetry

LI Shi-z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a geographic term, “Chang’an” used to refer to the capital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ut the term “Chang’an” in Song poetry referred to the capital in that period, such as Bianjing an Lin’an, what is more, it was endowed with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fter the study of the image of “Chang’an” frequently used in Song poetry, we find this term was used to refer to officialdom, kindness of the emperor, political ideal, political vanity fair and fun place. In Southern Song poetry, “Chang’an” referred to the lost northern territory. The rich and various meanings of “Chang’an” in Song poetry were associated not only with the reality of Song dynasty but also with the culture inheritance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Key words: Song poetry; Chang’an; image; official career

(上接第 5 页)

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因文化崇拜,各地出现了多处纪念性的陵庙,内中均无真身尸骨,没有必要争论谁真谁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陵庙祭祀地点却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因而也带有唯一性。自觉遵守成规,有助于中华民族彻底摆脱

琐细的分割,巩固历史形成的统一,这是大局;相对而言,地方利益再大,也是小局;以小局服从大局,应是每个国人立言、立事、立功的基本出发点。封建帝王尚且懂得按一人一地原则规范历代帝王陵庙的重要性,今日之大人先生者流,却懵懵懂懂,随意为左右袒,岂不是太缺乏政治智慧了吗?

Opinions on the site of mausoleum of Huangdi

ZHAO Shi-c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Huangdi is a legendary character or historical figure. For Huangdi’s temples and hometowns are only monuments, there is no need to argue whether they real or not. Whereas the ceremonial site by the rituals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is of conventional significance and it helps strengthen the unity,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herit and abide by the site.

Key words: Huangdi hometown; Huangdi mausoleum; HUANGFU Mi; *The age of kings*;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